

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

第二卷·别史卷

④

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编委会
大连海事大学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研究项目组 编
主编 孙光圻
副主编 刘义杰



海洋出版社

本卷系交通部交通应用基础研究项目成果

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

(第二卷·别史卷)

(4)

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编辑委员会
大连海事大学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研究项目组 编

主编 孙光圻 副主编 刘义杰

海洋出版社

北京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中国航海史基础文献汇编. 第2卷, 别史卷/孙光圻主编.—北京: 海洋出版社, 2009.6

ISBN 978-7-5027-7226-0

I. 中… II. 孙… III. 航海—交通运输史—文献—汇编—中国 IV.F552.9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09)第096890号

责任编辑: 魏京华

责任印制: 刘志恒

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

[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](http://www.oceanpress.com.cn)

(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8号 邮编: 100081)

西安煤航信息产业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

2009年6月第1版 2009年6月第1次印刷

开本: 880mm × 1230mm 1/16 印张: 249

字数: 7840千字 印数: 1 ~ 2000册

定价: 780.00元

发行部: 62147016 邮购部: 68038093 总编室: 62114335

海洋版图书印、装错误可随时退换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·市余考一·均输市易和买

东汉章帝时,尚书张林上言:“宜自交趾、益州上计吏往来,市珍宝,收采其利,武帝所谓均输也[谓租赋并雇运之直,官总取而官转输于京,曰均输]。”诏议之。

市舶互市

宋初,承周制,与江南通市。乾德二年,不许商旅涉江,于建安、汉阳、蕲口置三榷署,通其交市。开宝三年,徙建安榷署于扬州。及江南平,榷署仍旧置,专掌茶货。

互市者,自汉初与南粤通关市,其后匈奴和亲,亦与通市。后汉与乌桓、北单于、鲜卑通交易。后魏之宅中夏,亦于南陲立互市。隋、唐之际,常交戎夷,通其贸易。开元定令,载其条目。后唐复通北戎互市。此外,高丽、回鹘、黑水诸国,亦以风土所产与中国交易。

右宋《三朝国史·食货志》略言历代互市之概,今录于此。

开宝四年,置市舶司于广州,以知州兼使,通判兼判官。

止斋陈氏曰:“是时,市舶虽始置司,而不以为利。淳化二年,始立抽解二分,然利殊薄。元丰始委漕臣觉察拘拦,已而又置官望舶,而泉、杭、密州皆置司。崇宁置提举,九年之间,收至一千万矣。政和四年,施述奏:‘市舶之设,元符以前虽有,而所收物货十二年间至五百万。崇宁经画详备,九年之内收至一千万。’其后废置不常,今惟泉、广州提举官如故。”

北蕃在太祖时,虽听缘边市易,而未有官署。太平兴国二年,始令镇、易、雄、霸、沧州各置榷务,命常参官与内侍同掌,鞏香药、犀象及茶与交市。后有范阳之师,乃罢不与通。

端拱元年,复诏许互市。二年,复禁之。

淳化二年,置榷如旧制,寻复罢。

仁宗时,诏杭、明、广三州置市舶司,海舶至者,视所载十算其一而市其三。海舶岁入象犀、珠玉、香药之类,皇祐中,总其数五十三万有余。陕西榷场二,天圣中,并代路亦请置场和市,许之。及元昊反,即诏陕西、河东绝其互市,废保安军榷场。后又禁陕西并边主兵官与属羌交易。久之,元昊请臣,数遣使求复互市。庆历六年,从其请,复为置场于保安、镇戎二军,岁售马二千匹、羊万口。继言驱羊马至,无放牧之地,为徙保安军场于顺宁寨。既而番商卒无至者,朝廷亦不诘。

英宗治平四年,河东经略司言夏人丐通和市。初,夏人攻庆州大顺城,诏罢岁赐,禁边民毋得私贸易。至是,上章谢罪,复许之。

神宗熙宁八年,市易司请假奉宸库象、犀、珠直二十万缗,于榷场贸易,至明年终偿其直,从之。

九年,诏立与化外人私相贸易罪赏法,河北漕司请也。

河北四榷场,自治平四年,其物货专掌于三司之催辖司,而度支赏给案判官置簿督之。至是,以私贩者众,故有是命。

哲宗元祐元年,杭、明、广三州市舶,是年收钱、粮、银、香、药等五十四万一百七十三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,支二十三万八千五十六缗、匹、斤、两、段、条、个、颗、脐、只、粒。

五年,刑部言贾人由海道往外蕃,请令以贾物名数并所诣之地,报所在州召保,毋得参带兵器或违禁及可造兵器物,官给以文凭。若擅乘船由海入界河及往高丽、新罗、登莱州境者,罪以徒,往北界者加等。”

宣和七年,以度僧牒给舶司为折博本,广南、福建、两浙五百至三百各有差。

高宗绍兴三年,邕州守臣言大理请入贡。上谕大臣,令宝马可也,进奉可勿许。

臣僚言:“邕、钦、廉三州与交趾海道相连,亡赖之徒掠卖人口贩入其国,贸易金香以小平钱为约。”诏监司、守倅巡捕觉察。

建炎元年六月,诏:“市舶多以无用之物枉费国用,取悦权近。自今有以笃褥香指环、玛瑙、猫儿眼睛之类博买前来,及有亏蕃商者,皆重置其罪,今提举按察。惟宣赐臣僚象笏、犀带,取材舶司,每令拣选堪用者起发。”凡舶舟之来,最大者为独橈舶,能载一千婆兰,胡人谓三百斤为一婆兰也。次曰牛头舶,比独橈

得三之一。次三木舶,次料河舶,递得三之一也。

绍兴十七年十一月,诏三路舶司,蕃商贩到龙脑、沈香、丁香、白豆蔻四色,并抽解一分,余数依旧法。先是,十四年抽解四分,蕃商诉其太重故也。

上因问御史台检法张闾:“舶岁入几何?”闾奏:“抽解与和买,岁计之约得二百万缗。”上云:“即此即三路所入,皆常赋之外,未知户部如何收附,如何支使。”令辅臣取实数以闻。

隆兴二年,臣僚言:“熙宁初,创立市舶以通货物。旧法抽解有定数,而取之不苛,纳税宽其期,而使之待价,怀远之意实寓焉。迩来抽解名色既多,兼迫其输纳,使之货滞而价减,所得无几,恐商旅不行,乞下市舶司约束。”从之。既而市舶司条具利害,谓:“抽解旧法十五取一,其后十取其一。又后,择其良者,如犀、牙十分抽二,又博买四分;真珠十分抽一,又博买六分。舶户惧抽买数多,所贩止是粗色杂物。照得象牙、珠犀比他货至重,乞十分抽一之外,更不博买。且三路舶船,各有司存,旧法,召保给据起发,回日各于发舶处抽解,近缘两浙舶司申请随便住舶变卖,遂坏成法,乞下三路照旧法施行。兼商贾由海道兴贩,其间或有盗贼、风波、逃亡者,回期难以程限,乞令召物力户充保,自给公凭日为始,若在五月内回舶,与优饶抽税;如满一年内,不在饶税之限;满一年之上,许从本司根究,责罚施行;若有透漏,元保物力户同坐。”从之。

见任官将钱寄附纲首商旅过蕃买物者有罚,舶至,抽解和买入官外,违法抑买,许蕃商越诉,计赃坐罪。

国家三路舶司岁入固不少,然金银铜铁,海舶飞运,所失良多,而铜钱之泄尤甚,民用日以枵。法禁虽严,奸巧愈密,商人贪利而暮夜贸迁,黠吏受赇而纵释莫问,其弊卒不可禁矣。

六年,诏诸市舶纲首能招诱舶船,抽解物货累价及五万贯补助以上者补官有差,监官推赏。其后监官等止将海商入蕃兴贩,便作招诱计数,该赏者多而发到香货下色者皆充数组估,乃诏舶司相度措置,毋容侥幸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二·土贡考一·历代土贡[进奉羨余]

徽宗政和七年,置提举御前人船所。时东南监司、郡守、二广市舶率有应奉,又有不待旨,但送物至都,计会宦者以献。大率灵壁、太湖、慈口溪、武康诸石,二浙奇竹、异花、海错,福建荔枝、橄榄、龙眼,南海椰实,登、莱文石,湖湘文竹,四川佳果木,皆越海渡江,毁桥梁、凿城郭而至,植之皆生,而异味珍苞则以健步捷走,虽甚远,数日即达,色香未变也。乃作提举淮、浙人船所,命内侍邓文浩领之。蔡京以曩备东封船二千艘及广济兵士四营,又增制作牵驾人,乞诏人船所比直达纲法,自后所用,即从御前降下,使系应奉人船所数贡人,余皆不许妄进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三·国用考一·历代国用

魏武西迁,连年战争,河、洛之间,又并空竭,迁都于邺。时六坊之众从武帝而西者,不能万人,余皆北徙,并给常廩,逐丰稔之处,折绢杂粟,以充国储。于诸州缘河津济,皆官仓贮积,以拟漕运;于沧、瀛、幽、青四州之境,傍海置盐官以煮盐,每岁收钱,军国之资,得以周贍。

开宝元年,诏诸道给舟车輦送上供钱帛。

止斋陈氏曰:“国初上供随岁所入,初无定制,而其大者在粮、帛、银、钱、诸路米纲。《会要》:开宝五年,令汴、蔡河岁运江淮米数十万石赴京充军食;太平兴国六年,制岁运三百五十万石;景德四年,诏淮南、江、浙、荆湖南北路,以至道二年至景德二年终十年酌中之数,定为年额,上供六百万石。米纲立额始于此。银纲,自大中祥符元年诏五路粮储已有定额,其余未有条贯,遂以大中祥符元年以前最为多者为额,则银纲立额始于此。钱纲,自天禧四年四月三司奏请立定钱额,自后每年依此额数起发,则钱纲立额始于此。绢绵纲虽不可考,以咸平三年三司初降之数,则亦有年额矣。然而前朝理财务在宽大,随时损益,非必尽取。上供增额起于熙宁,虽非旧贯,尤未为甚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四·国用考二·历代国用

右司谏苏辙奏：“臣窃闻熙宁以来，天下财赋文帐，皆以时上于三司。……帐司之兴，盖始于此。张设官吏，费用钱物，至元丰三年，首尾七八年间，帐司所管吏仅六百人，用钱三十九万贯，而所磨出失陷钱止一万余贯。朝廷知其无益，遂罢帐司，而使州郡应申省帐皆申转运司，内钱帛、粮草、酒曲、商税、房园、夏秋税管额纳毕，盐帐，水脚、铸钱物料、稻糯帐，本司别造计帐申省，其驿料、作院欠负、修造竹木杂物、舟船、柴炭、修河物料、施利桥船物料、车、驴、草料等帐，勘勾讫架阁。……”

元丰初，作元丰库，岁发坊场百万缗输之。大观时，又有大观东、西库。徽宗崇宁后，蔡京为相，增修财利之政，务以侈靡惑人主，动以《周官》惟王不会为说，每及前朝爱惜财赋减省者，必以为陋。至于土木营造，率欲度前规而侈后观。元丰官制既行，赋禄视嘉祐、治平既优，京更增供给、食料等钱，于是宰执皆增。京又专用丰亨豫大之说，谀悦帝意，始广茶利，岁以一百万缗进御，以京城所主之，于是费用浸广。其后又有应奉司、御前生活所、营缮所、苏杭造作局、御前人船所，其名纷如，大率皆以奇侈为功。岁运花石纲，一石之费，至用三十万缗。牟取无艺，民不胜弊。时国度日繁，左藏库异时月费缗钱三十六万，至是，衍为一百二十万缗。又三省、密院吏员猥杂，有官至中大夫，一身而兼十余俸者，故当时议者有“俸入超越从班，品秩几于执政”之言。吏禄滥冒已极，以史院言之，供检三省几千人。蔡京又动以笔贴于榷货务支赏给，有一纸至万缗者。京所侵私，以千万计，朝论益喧。

户部言：“本部岁用六百余万缗，悉倚上供。官吏违负者，请以分数为科罪之等，不及九分者，罪以徒，多者更加之。岁首则列次年之数，闻于漕司，考实申部。”从之。是年，以无额钱物督限未严，乃更一季为一月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五·国用考三·漕运

秦欲攻匈奴，运粮，使天下飞刍挽粟[运载刍稿令疾至，故曰飞刍。挽粟，谓引车船也。]起于黄、腠[东莱二县]、琅琊负海之郡，转输北河[言沿海诸郡，皆令转输至北河。北河，今朔方之北河也]，率三十钟而致一石[六斛四斗为钟。计其道路所费，凡用百九十二斛乃得一石]。

汉兴，高帝时，漕运山东之粟，以给中都官，岁不过数十万石。

娄敬说帝都关中。张良曰：“关中阻三面而守独以一面，东制诸侯，诸侯安定；河、渭漕挽天下，西给京师，诸侯有变，顺流而下，足以委输，敬说是也。”孝文时，贾谊上说曰：“天子都长安，而以淮南东道为奉地，镹道数千，不轻致输，郡或乃越诸侯而远调均发征，至无状也。古者天子地方千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由使，其远者不在五百里而至；公侯地百里，中之而为都，输将由使，远者不在五十里而至。输者不苦其由，由者不伤其费，故远方人安。及秦，不能分人寸地，欲自有之，输将起海上而来，一钱之赋，数十钱之费，不轻而致也。上之所得甚少，而人之所苦甚多也。”

孝武建元中，通西南夷，作者数万人，千里负担馈粮，至十余钟致一石。其后，东灭朝鲜，置沧海郡，人徒之费，拟西南夷。又卫青击匈奴，取河南地[今朔方]。复兴十万余人，筑卫朔方，转漕甚远，自山东咸被其劳。

元光中，大司农郑当时言于帝曰：“异时关东运粟，漕水从渭中上，度六月而罢，而渭水道九百余里，时有难处。引渭穿渠，起长安，傍南山下，至河三百余里，径易漕，度可三月罢，而渠下民田万余顷，又可得以溉，此损漕省卒，而益肥关中之地，得谷。”上以为然，发卒穿渠以漕运，大便利也。其后，番系言：“漕从山东西，岁百余万石，更底柱之险，败亡甚多，而亦颇费。穿渠引汾，溉皮氏、汾阴下，引河溉汾阴、蒲阪下[皮氏，今绛郡龙门县。汾阴、蒲阪，今河东郡宝鼎、河东二县]，度可得五千顷，故尽河堧弃地，度可得谷二百万石以上。谷从渭上，与关中无异，而底柱之东，可无复漕。”上又以为然，发卒作渠田。数岁，河移徙，渠不到，田者不能偿种。久之，河东渠田废，予越人，令少府以为稍入[时越人徙者以田予之，其租税入少府，

其入未多,故谓之稍]。其后,又有人上书欲通褒斜道[褒、斜,二水名。褒水东流,南入沔,今汉中郡褒城县。斜水北流入渭,今武功县及扶风郡]。及漕,事下御史大夫张汤,汤言:“抵蜀从故道,多阪,回远。今穿褒斜道,少阪,近四百里。而褒水通沔,斜水通渭,皆可以行船漕。漕从南阳上沔入褒,褒绝水至斜,间百余里,以车转,从斜入渭。如此,汉中谷可致,而山东从沔无限,便于底柱之漕,且褒、斜材木竹箭之饶,拟于巴蜀。”上以为然,拜汤子卬为汉中守,发数万人作褒斜道五百余里。道果便近,而水多湍石,不可漕。

武帝作柏梁台,宫室之修,由此日丽。徒奴婢众,而下河漕度四百万石,及官自籴乃足。

元封元年,桑弘羊请令民入粟补吏、赎罪,他郡各输急处,而诸农各致粟,山东漕益岁六百万石。一岁之中,太仓、甘泉仓满,边余谷。

按:汉初,致山东之粟,不过岁数十万石耳。至孝武,而岁至六百万石,则几十倍其数矣。虽征敛苛烦,取之无艺,亦由河渠疏利,致之有道也。

昭帝元凤二年,诏曰:“前年减漕三百万石。”三年,诏曰:“民被水灾,颇匱于食,其止四年勿漕。”

孝宣即位,岁数丰穰,耿寿昌五凤中奏言:“故事,岁漕关东谷四百万斛以给京师,用卒六万人。宜籴三辅、弘农、河东、上党、太原等郡谷,足供京师,可以省关东漕卒过半。”天子从其计。御史大夫萧望之奏言:“寿昌欲近籴漕关内之谷,筑仓理船,费直二万万余[万万,亿也],有动众之功,恐生旱气,人被其灾,寿昌习于商功分铢之事,其深计远虑,诚未足任,宜且如故。”帝不听,漕事果便。

光武北征,命寇恂守河内,收租四百万斛以给军,以犍车驷驾,转输不绝。

虞诩为武都太守,开漕船道,而水运通利。

明帝永平十三年,汴渠成。河、汴分流,复其旧迹。初,平帝时,河、汴决坏,久而不修。建武时,光武欲修之而未果。其后,汴渠东侵,日月弥广,兖、豫百姓怨叹。会有荐乐浪王景能治水者,乃诏发卒数十万,遣景与将作谒者王吴修汴渠堤,自荥阳东至千乘海口千余里。十里立一水门,令更相洄注,无溃漏之患。费以百亿计。

致堂胡氏曰:“世言隋炀帝开汴渠以幸扬州。文士考《禹贡》言尧都冀州,居河下流,而八州贡赋重于用民力,故每州必记入河之水。独淮与河无相通之道,求之故迹而不得,乃疑汴水自禹以来有之,不起于隋。世既久远,或名鸿沟,或名官渡,或名汴渠,大概皆自河入淮,故淮可引江湖之舟以达于冀也。今据《后汉书》,则平帝时已有汴渠,曰‘河、汴决坏’,则谓输受之所也。至是,发卒四十万修渠堤,则平地起两岸,而汴水行其中也。十里立一水门,更相洄注,则以节制上流,恐河溢为患也。是正与今之汴渠制度无异,特未有导洛之事耳。史曰‘渠堤自荥阳而东’,则上疑其为鸿沟,下疑其为官渡者,恐未得其要。官渡直黄河也,故袁、曹相距,沮授曰:‘悠悠黄河,吾其济乎!’汴渠自西而东,鸿沟乃横亘南北,故曰未得其要也。独所谓自禹以来有汴者,此则不易之论也。”

汉丞相诸葛亮劝农讲武,作木牛流马运米,集斜谷口,治斜谷邸阁,息民休士三年而后用之。

木牛,其法:“方腹曲头,一脚四足,头入领中,舌著于腹。载多而行少,宜住,可大用,而不可小使;特行者数十里,群行者二十里。曲者为牛头,双者为牛脚,横者为牛领,转者为牛足,覆者为牛背,方者为牛腹,垂者为牛舌,曲者为牛肋。刻者为牛齿,立者为牛角,细者为牛鞅,撮者为牛鞅轴。牛御双辕,人行六尺,牛行四步。载一岁粮,日行三十里,而人不大劳,牛不饮食。”流马亦有尺寸之数。

先公曰:“邸阁者,仓禀之异名欤!魏晋以来多称之。《晋史·景纪》言,蜀将姜维寇狄道,帝曰:‘姜维攻羌,收其质任,聚谷作邸阁讫而复转行至此’云云。是邸阁者,仓禀之名耳。”

魏齐王正始四年,司马宣王使邓艾行陈、项以东至寿春[今淮阳郡至寿春郡]。艾以为田良水少,不足以尽地利,宜开河渠,可以大积军粮,又通运漕之道。宣王从之,乃开广漕渠。东南有事,兴众泛舟而下,达于江淮,资食有储而无水害,艾所建也[语在《屯田篇》]。

晋武帝太始十年,凿陕南山,决河,东注洛以通运漕[虽有此诏,竟未成功]。

怀帝永嘉元年,修千金竭于许昌以通运。

成帝咸和六年,以海贼寇抄,运漕不继,发王公以下千余丁,各运米六斛。

穆帝时,频有大军,粮运不继,制王公已下十三户共借一人,助度支运。

赵王虎以租入殷广,转输劳烦,令中仓岁入百万斛,余皆储之水次;令刑赎之家得以钱代财帛,无钱听以谷麦,皆随时价输水次仓。

后魏自徐扬内附之后[徐州,今彭城。扬州,今寿州],仍代经略江淮。于是转运中州,以实边镇,百姓疲于道路。有司请于水运之次,随便置仓,乃于小平、石门、白马津、漳涯、黑水、济州、陈郡、大梁凡八所,各立邸阁,每军国有需,应机漕引。自此费役微省。时三门都将薛钦上言:“计京西水次汾、华二州,恒农、河北、河东、正平、平阳等郡,年常绵绢及黄麻皆折公物,雇车牛送京,道险人敝,费公损私。略计华州一车,官酬绢八匹三丈九尺,别有私人雇价布八十匹;河东一车,官酬绢五匹二丈,别有私人雇价布五十匹。自余州郡,虽未练多少,推之远近,应不减此。今求车取雇绢三匹,市木造船,不劳采斫。计船一艘,举十三车,车取三匹,合有三十九匹,雇作手并匠及船上杂具食直,足以成船。计一船剩绢七十八匹,布七百八十匹。又租车一乘,官格二十斛成载;私人雇价,远者五斗布一匹,近者一石布一匹。准其私费,一车有布远者八十匹,近者四十匹。造船一艘,计举七百石,准其雇价,应有千四百匹。今取布三百匹造船一艘,并船上覆理杂事,计一船有剩布千一百匹。又其造船之处,皆须锯材人功,并削船茹,依功多少,即给当州郡门兵,不假更召。汾州有租调之处,去汾不过百里,华州去河不满六十,并令计程依旧酬价,车送船所。船之所运,唯达濡陂。其陆路从濡陂至仓门,调一车雇绢一匹,租一车布五匹,则于公私为便。”诏从之,而未能尽行也。

孝文太和七年,薄骨律镇将刁雍上表曰:“奉诏高平、安定、统万[薄骨律镇,今灵武郡。高平,今平凉郡。安定,即今郡。统万,即朔方郡也]及臣所守四镇,出车五千乘,运屯谷五十万斛,付沃野镇以供军粮。臣镇去沃野八百里,道多深沙,轻车往来,犹以为难,设令载谷二十石,每至深沙,必至滞陷。又谷在河西,转至沃野,越渡大河,计车五千乘运十万斛,百余日乃得一返,大废生人耕垦之业。车牛艰阻,难可全至,一岁不过二运,五十万斛乃经三年。臣闻郑、白之渠,远引淮海之粟,溯流数千里,周年乃得一至,犹称国有储粮,人用安乐。求于崕岷山[在今平凉郡高平县,今笄头山语讹亦曰汧岷山,即崕岷山也]河水之次造船二百艘,二船为一舫,一船胜谷二十斛,一舫十人,计须千人。臣镇内之兵,率皆习水。一运二十万斛,方舟顺流,五日而至。自沃野牵上,十日还到,合六十日得一返。从三月至九月三返,运送六十万斛,计用人工轻于车运十倍有余,不费牛力,又不废田。”诏曰:“知欲造船运谷,一冬即成,大省人力,既不费牛,又不废田,甚善。非但一运,自可永以为式。”

隋文帝开皇三年,以京师仓禀尚虚,议为水旱之备,诏于蒲、陕、虢、熊、伊、洛、郑、怀、邵、卫、汴、许、汝等水次十三州[熊州,今福昌县。伊州,今陆浑县。洛州,今绛县。余县并今郡]置募运米丁。又于卫州置黎阳仓,洛州置河阳仓,陕州置常平仓,华州置广通仓[卫、陕、华并今郡],转相灌注。漕关东及汾、晋之粟,以给京师。又遣仓部侍郎韦瓚,向蒲、陕以东,募人能于洛阳运米四十石,经底柱之险,达于常平者,免其征戍。其后以渭水多沙,流有深浅,漕者苦之。四年,诏宇文恺率水工凿渠,引渭水,自大兴城[即今西京城也]东至潼关,三百余里,名曰广通渠。转运通利,关内便之。

炀帝大业元年,发河南诸郡男女百余万开通济渠,自西苑引谷、洛水达于河。又引河通于淮海。自是天下利于转输。四年,又发河北诸郡百余万众开永济渠。引沁水,南达于河,北通涿郡[今范阳郡]。自是丁男不供,始以妇人从役。五年,于西域之地置西海、鄯善、且末等郡[逐吐谷浑得其地,并在今酒泉、张掖、晋昌郡之北,今悉为北狄之地]。谪天下罪人,配为戍卒,大开屯田,发四方诸郡运粮以给之。七年冬,大会涿郡。分江淮南兵配骁卫大将军来护儿,别以舟师济沧海,舳舻数百里。并载军粮,期与大兵会于平壤[高丽所都]。置洛口回洛仓,穿三千三百窖,窖容八千。

致堂胡氏曰:“隋炀积米,其多至二千六百余万石,何凶旱水溢之足虞!然极奢于内,穷武于外,耕桑失业,民不聊生,所谓江河之水不能实漏瓮。仓窖充盈,适足为重敛多藏之罪耳。”

唐都长安,而关中号称沃野,然其土地狭,所出不足以给京师,备水旱,故常转漕东南之粟。高祖、太宗之时,用物有节而易贍,水陆漕运,岁不过二十万石,故漕事简。自高宗以后,岁益增多,而功利繁兴,民亦罹其弊矣。初,江淮漕租米至东都输含嘉仓,以车或驮陆运至陕。而水行来远,多风波覆溺之患,其失常十

七八,故其率一斛得八斗为成劳。而陆运至陕才三百里,率两斛计庸钱千。民送租者,皆有水陆之直,而河有三门底柱之险。显庆元年,苑西监褚朗议凿三门山为梁,可通陆运。乃发卒六千凿之,功不成。其后,将作大匠杨务廉又凿为栈,以挽漕舟。挽夫系二钗于胸,而绳多绝,挽夫辄坠死,则以逃亡报,因系其父母妻子,人以为苦。开元十八年,宣州刺史裴耀卿朝集京师,玄宗访以漕事,耀卿条上。便宜,曰:“江南户口多,而无征防之役。然送租、庸、调物,以岁二月至扬州入斗门,四月已后,始渡淮入汴,常苦水浅,六七月乃至河口,而河水方涨,须八九月水落,始得上河入洛,而漕路多梗,船楫阻隘。江南之人,不习河事,转雇河师水手,重为劳费。其得行日少,阻滞日多。今汉、隋漕路,濒河仓禀,遗迹可寻。可于河口置武牢仓,巩县置洛口仓,使江南之舟不入黄河,黄河之舟不入洛口。而河阳、柏崖、太原、永丰、渭南诸仓,节级转运,水通则舟行,水浅则寓于仓以待,则舟无停留,而物不耗失。此甚利也。”玄宗初不省。二十一年,耀卿为京兆尹,京师雨水,谷踊贵,玄宗将幸东都,复问耀卿漕事,耀卿因请罢陕陆运,而置仓河口,使江南漕舟至河口者,输粟于仓而去,县官雇舟以分入河、洛;置仓三门东西,漕舟输其东仓,而陆运以输西仓,复以舟漕,以避三门之水险。玄宗以为然,乃于河阴置河阴仓,河清置柏崖仓,三门东置集津仓,西置盐仓;凿山十八里以陆运。自江淮漕者,皆输河阴仓,自河阴西至太原仓,谓之北运,自太原仓浮渭以实关中。玄宗大悦,拜耀卿为黄门侍郎、同中书门下平章事,兼江淮都转运使,以郑州刺史崔希逸、河南少尹萧灵为副使,益漕晋、绛、魏、濮、邢、贝、济、博之租输诸仓,转而入渭。凡三岁,漕七百万石,省陆运佣钱三十万缗。是时,民久不罹兵革,物力丰富,朝廷用度亦广,不计道里之费,而民之输送所出水陆之直,增以“函脚”、“营窖”之名,民间传言用斗钱运斗米,其糜耗如此。及耀卿罢相,北运颇艰,米岁至京师才百万石。二十五年,遂罢北运。而崔希逸为河南陕运使,岁运百八十万石。其后,以太仓积粟有余,岁减漕数十万石。二十九年,陕郡太守李齐物凿底柱为门以通漕,开其山巅为挽路,烧石沃醴而凿之。然弃石入河,激水益湍怒,舟不能入新门,候其水涨,以人挽舟而上。天子疑之,遣宦者按视,齐物厚赂使者,还言便。齐物人为鸿胪卿,以长安令韦坚代之,兼水陆运使。坚治汉、隋运渠,起关门,抵长安,通山东租赋。乃绝灋浚,并渭而东,至永丰仓与渭合。又于长乐坡濒苑墙凿潭于望春楼下,以聚漕舟。坚因使诸舟各揭其郡名,陈其土地所产宝货诸奇物于楸上。先时民间唱俚歌曰“得休吃那邪”。其后得宝符于桃林,于是陕县尉崔成甫更《得休歌》为《得宝弘农野》。坚命舟人为吴、楚服,大笠、广袖、芒屨以歌之。成甫又广之为歌辞十阙,自衣阙后绿衣、锦半臂、红抹额,立第一船为号头以唱,集两县妇女百余人,鲜服靓妆,鸣鼓吹笛以合之。众艘以次褰楼下,天子望见大悦,赐其潭名曰广运潭。是岁,漕山东粟四百万石。自裴耀卿言漕事,进用者常兼转运之职,而韦坚为最。初,耀卿兴漕路,请罢陆运,而不果废。自景云中,陆运北路分八递,雇民车牛以载。开元初,河南尹李杰为水陆运使,运米岁二百五十万石,而八递用车千八百乘。耀卿罢久之,河南尹裴迥以八递伤牛,乃为交扬两递,滨水处为宿场,分官总之,自龙门东山抵天津桥为石堰以遏水。其后大盗起,而天下匱矣。肃宗末年,史朝义兵分出宋州,淮运于是阻绝,租庸盐铁溯汉江而上。河南尹刘晏为户部侍郎,兼勾当度支、转运、盐铁、铸钱使,江淮粟帛,由襄、汉越商于输京师。及代宗出陕州,关中空窘,于是盛转输以给用。广德二年,废勾当度支使,以刘晏领东都、河南、淮西、江南东西转运、租庸、铸钱、盐铁,转输至上都,度支所领诸道租庸观察使,凡漕事亦皆决于晏。晏即盐利雇佣分吏督之,随江、汴、河、渭所宜。故时转运船由润州陆运至扬子,斗米费钱十九,晏命囊米而载以舟,减钱十五;由扬州距河阴,斗米费钱百二十,晏为歌艘支江船二千艘,每船受千斛,十船为纲,每纲三百人,篙工五十人,自扬州遣将部送至河阴,上三门,号“上门填阙船”,米斗减钱九十。调巴、蜀、襄、汉麻枲竹箬为绹挽舟,以朽索腐材代薪,物无弃者。未十年,人人习河险。江船不入汴,汴船不入河,河船不入渭;江南之运积扬州,汴河之运积河阴,河船之运积渭口,渭船之运入太仓。岁转粟百一十万石,无升斗溺者。轻货自扬子至汴州,每驮费钱二千二百,减九百,岁省十余万缗。又分官吏主丹阳湖,禁引溉,自是河漕不涸。大历八年,以关内丰穰,减漕十万石,度支和籴以优农。晏自天宝末掌出纳,监岁运,知左右藏,主财谷三十余年矣。及杨炎为相,以旧恶罢晏,转运使复归度支,凡江、淮漕米,以库部郎中崔河图主之。及田悦、李惟岳、李纳、梁崇义拒命,举天下兵讨之,诸军仰给京师。而李纳、田悦兵守渦口,梁崇义扼襄、邓,南北漕引皆绝,京师大恐。江淮水陆转运使杜佑以秦、汉运路出浚

仪十里入琵琶沟,绝蔡河,至陈州而合,自隋凿汴河,官漕不通,若导流培岸,功用甚寡;疏鸡鸣冈首尾,可以通舟,陆行才四十里,则江、湖、黔中、岭南、蜀、汉之粟可方舟而下,由白沙趣东关,历颍、蔡,涉汴抵东都,无浊河溯淮之阻,减故道二千余里。会李纳将李洧以徐州归命,淮路通而止。户部侍郎赵赞又以钱货出淮迂缓,分置汴州东西水陆运两税盐铁使,以度支总大纲。贞元初,关辅宿兵,米斗千钱,太仓供天子六宫之膳不及十日,禁中不能酿酒,以飞龙驼负永丰仓米给禁军,陆运牛死殆尽。德宗以给事中崔造敢言,为能立事,用为相。造以江、吴素嫉钱谷诸使颡利罔上,乃奏诸道观察使、刺史选官部送两税至京师,废诸道水陆转运使及度支巡院、江淮转运使,以度支、盐铁归尚书省,宰相分判六尚书事。以户部侍郎元琇判诸道盐铁、榷酒,侍郎吉中孚判度支诸道两税。增江、淮之运,浙江东、西岁运米七十五万石,复以两税易米百万石,江西、湖南、鄂岳、福建、岭南米亦百二十万石,诏浙江东、西节度使韩滉,淮南节度使杜亚运至东、西渭桥仓。诸道有盐铁处复置巡院,岁终宰相计课最。崔造厚元琇,而韩滉方领转运,奏国漕不可改。帝亦雅器滉,复以为江淮转运使。元琇嫉其刚,不可共事,因有隙。琇称疾罢,而滉为度支、诸道盐铁、转运使,于是崔造亦罢。滉遂劾琇常馈米淄青、河中,而李纳、怀光倚以构叛,贬琇雷州司户参军,寻赐死。是时,汴宋节度使春夏遣官监汴水,察盗灌漑者。岁漕经底柱,覆者几半。河中有山号“米堆”,运舟入三门,雇平陆人为门匠,执标指麾,一舟百日乃能上。谚曰:“古无门匠墓。”谓皆溺死也。陕虢观察使李泌益凿集津仓山西径为运道,属于三门仓,治上路以回空车,费钱三万缗,下路减半;又为入渭船,方五板,输东渭桥太仓米至凡百三十万石,遂罢南路陆运。其后诸道盐铁、转运使张滂复置江淮巡院。及浙西观察使李锜领使,江淮堰埭隶浙西者,增私路小堰之税,以副使潘孟阳主上都留后。李巽为诸道转运、盐铁使,以堰埭归盐铁使,罢其增置者。自刘晏后,江淮米至渭桥浸减矣,至巽乃复如晏之多。初,扬州疏太子港、陈登塘,凡三十四陂,以益漕河,辄复堙塞。淮南节度使杜亚乃浚渠蜀冈,疏句城湖、爱敬陂,起堤贯城,以通大舟。河益庠,水下走淮,夏则舟不得前。节度使李吉甫筑平津堰,以泄有余,防不足,漕流遂通。然漕益少,江淮米至渭桥者才二十万斛。以诸道盐铁、转运使卢坦余以备一岁之费,省冗职八十员。自江以南,补署皆割属院监,而漕米亡耗于路颇多。刑部侍郎王播代坦,建议米至渭桥五百石亡五十石者死。其后判度支皇甫镈议万斛亡三百斛者偿之,千七百斛者流塞下,过者死;盗十斛者流,三十斛者死。而覆船败挽,至者不得十之四五。部吏舟人相挟为奸,榜笞号苦之声闻于道路,禁锢连岁,赦下而狱死者不可胜数。其后贷死刑,流天德五城,人不畏法,运米至者十亡七八。盐铁转运使柳公绰请如王播议加重刑。太和初,岁旱河涸,掇沙而进,米多耗,抵死甚众,不待覆奏。秦汉时故漕兴成堰,东达永丰仓,咸阳县令韩辽请疏之,自咸阳抵潼关三百里,可以罢车挽之劳。宰相李固言以为非时,文宗曰:“苟利于人,阴阳拘忌,非朕所顾也。”议遂决。堰成,罢挽车之牛以供农耕,关中赖其利。故事,州县官充纲,送轻货四万,书上考。开成初,为长定纲,州择清疆官送两税,至十万迁一官,往来十年者授县令。江淮钱积河阴,转输岁费十七万余缗,行纲多以盗抵死。判度支王彦威置县递群畜万三千三百乘,使路傍民养以取佣,日役一驿,省费甚博。而宰相亦以长定纲命官不以材,江淮大州,岁授官者十余人,乃罢长定纲,送五万者书上考,七万者减一选,五十万减三选而已。及户部侍郎裴休为使,以河濒县令董漕事,自江达渭,运米四十万石。居三岁,米至渭桥百二十万石。凡漕达于京师而足国用者,大略如此。其他州、县、方镇,漕以自资,或兵所征行,转运以给一时之用者,皆不足纪。

贞元初,陆贄上奏,言:“邦畿之税,给用不充,东方岁运租米,冒淮湖风浪之险,溯河、渭湍险之艰,费多而益寡。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,则曰国之大事,不计费损,故有用斗钱运斗米之言。虽知劳烦,不可废也。习近利而不防远虑者,则曰每至秋成,但令畿内和籴,既易集事,又足劝农,何必转输,徒耗财用。臣以两家之论,互有短长,各申偏执之怀,俱昧变通之术。若国家理安,钱谷俱富,烝黎蕃息,力役靡施,然后常以羨财,益广漕运,虽有厚费,适资贫人。贞元之始,巨盗初平,太仓无兼月之储,关辅遇连年之旱,而有司奏停水运,务省脚钱,至使郊畿烟火殆绝,餒殍相望,斯所谓睹近利而不防远患者也。近岁关辅年谷屡登,数减百姓税钱,许其折纳粟麦,公储委积,足给数年,农家犹苦谷贱。今夏江淮水潦,漂损田苗,米价倍贵,流庸颇多,关辅以谷贱伤农,宜加价籴谷,以劝稼穡。江淮以谷贵民困,宜减价粜米,以救凶灾。今宜籴之

处则无钱,宜糴之处则无米,而又运彼所乏,益此所余,所谓习闻见而不达时宜者也。今淮南诸州米,每斗当钱一百五十文,从淮入渭桥,每斗船脚又约用钱二百文,计运米一斗,总当钱三百五十文,其米既糙且陈,尤为京邑所贱。据市司月估,每斗只糴得钱三十七而已,耗其九而存其一,馁彼人而伤此农,制事若斯,可谓深失矣。今约计一年和籴之数,可当转运二年;一斛转运之资,足以和籴五斛。比较即时利害,运务且合悉停。臣窃虑停运,则舟船无用,坏烂莫修;倘遇凶灾,复须转漕,临时鸠集,理必淹迟。臣今欲减所转之数,以实边储。其江淮诸道,运米至河阴,河阴运米至太原仓,太原运米至东渭桥,来年各请停所运三之二。其江淮所停运米八十万斛,委转运使每斗取八十钱,于水灾州县糴之,以救贫乏,计得钱六十四万缗,减餽直六十九万缗。请令户部先以二十万缗付京兆,令籴米以补渭桥仓之阙数,斗用百钱,以利农人;以一百二万六千缗付边镇,使籴十万人一年之粮,余十万四千缗,以充来年和籴之价;其江、淮米钱餽直,并委转运使折市绫、绢、緇、绵,以输上都,偿先贷户部钱,如此,则不扰一人,无废百事。但于常用之内,收其枉费之资,百万赢粮,坐实边鄙,又有劝农振乏之利,存乎其间矣!”

元祐间,东坡苏氏《论纲梢欠折利害奏状》曰:“臣闻唐代宗时,刘晏为江淮转运使,始于扬州造转运船,每船载一千石,十船为一纲,扬州差军将押赴河阴。每造一船,破钱一千贯,而实费不及五百贯。或讥其枉费,晏曰:‘大国不可以小道理,凡所创置,须谋经久,船场既兴,执事者非一,须有余剩,养活众人,私用不窘,则官物牢固。’乃于扬子县置十船场,差专知官十人,不数年间,皆致富贍。凡五十余年,船场既无破败,馈运亦不阙绝。至咸通末,有杜侍御者,始以一千石船,分造五百石船二只,船始败坏。而吴尧卿者,为扬子院官,始勘会每船合用物料,实数估给,其钱无复宽剩。专知官十家即时冻馁,而船场遂破,馈运不给,不久遂有黄巢之乱,刘晏以一千贯造船,破五百贯为干系人欺隐之资,以今之君子寡见浅闻者论之,可谓疏缪之极矣!然晏运四十万石,当用船四百只,五年而一更造,是岁造八十只也。每只剩破五百贯,是岁失四万贯也。而吴尧卿不过为朝廷岁宽四万贯耳!得失至微,而馈运不继,以贻天下之大祸。臣以此知天下之大计,未尝不成于大度之士,而败于寒陋之小人也。国家财用大事,安危所出,愿常不与寒陋小人谋之,则可以经久不败矣。”

按:西汉与唐俱都关中,皆运东南之粟以饷京师,自河、渭溯流而上,然汉武帝时,运六百万斛,唐天宝极盛之时,韦坚为水陆运使,仅一岁能致四百万斛余。岁止二百五十万斛。而至德以后,仅百余万而已,俱未能如汉之数。且考之《食货志》,及参以陆、苏二公之言,则运弥艰,费弥重,岂古今水道有险易之不同邪?当考。

咸通元年,南蛮陷交趾,征诸道兵赴岭南。诏湖南水运自湘江入潯渠,并江西水运,以馈行营诸军。溯运艰难,军屯广州乏食,润州人陈礪石诣阙言:“海船至福建,往来大船一只可致千石;自福建不一月,至广州得船数十艘,便可得三五万石,胜于江西、湖南溯流运粮。”又引刘裕海路进军破卢循故事。乃以礪石为盐铁巡官往扬子县专督海运,于是军不阙供。

后唐同光三年,吏部尚书李琪奏请敕下诸道,合差百姓转般之数,有能出力运官物到京者,五百石以上,白身授一初任州县官,有官者依资次迁授,欠选者便与放选,千石以上至万石者,不拘文武,显示赏酬。免令方春农人流散,此亦转仓贍军之一术也。敕租庸司下诸州,有应募者闻奏施行。

长兴二年,敕应沿河船般仓,依北面转运司船般仓例,每一石于数内与正销破二升。

四年二月,三司使奏:“洛河水运,自洛口至京,往来牵船下卸,皆是水运,牙官每人管定四十石。今洛岸至仓门稍远,牙官运转艰难,近日例多逃走。今欲于洛河北岸别凿一湾,引船直至仓门下卸,其工役欲于诸军僦人内差借。”从之。

周显德二年,上谓侍臣曰:“转输之物,向来皆给斗耗,自汉以来,不与支破。仓禀所纳新物,尚破省耗,况水路所般,岂无损失,今后每石宜与耗一斗。”

致堂胡氏曰:“受税而取耗,虽非良法,诚以给用,犹不使民徒费。今观世宗之言,则知晋、汉间取雀鼠耗及省耗,未尝为耗用,直多取以实仓禀耳。比及输运,其当给耗,反不与之,而或责之纲吏,或还使所出州县补其亏数,亡身破家,不可胜计,岂为国抚民之道也!不宜取而取者,省耗糜费是也;当予而未尝予者,漕

运斗耗是也。世宗既与之,善矣;省耗应罢而未罢,岂非以多故未及邪?明宗、潞王时,可谓窘匮,犹放逋租数百万,世宗诚欲蠲除省耗,又何难哉?

四年,诏疏下汴水,一派北入于五丈河,又东北达于济。自是,齐、鲁之舟楫皆至京师。

六年,命侍卫马军都指挥使韩令坤,自京东疏汴水入于蔡河。侍卫步军都指挥使袁彦,浚五丈河以通漕运。

宋东京之制:受四方之运者,谓之“船般仓”,曰永丰、通济、万盈、广衍[通济有四仓,景德四年改第三曰万盈,第四曰广衍]、延丰[旧广利,景德中改。大中祥符年,增第二]、顺成[旧常丰,景德中改]、济远[旧常盈,景德中改]、富国,凡十仓,皆受江淮所运,谓之东河,亦谓之里河。曰永济、永富二仓,受怀、孟等州所运,谓之西河。曰广济第一仓,受颍、寿等州所运,谓之南河,亦谓之外河。曰广积、广储二仓,受曹、濮等州所运,谓之北河。受京畿之租者,谓之税仓。曰广济第二仓,受京东诸县。广积第一、左右骐驎院、天驷监凡三仓,受京北诸县。左天厩坊仓受京西诸县[旧有义丰仓,大中祥符元年改]。大盈、右天厩二仓,受京南诸县。受商人入中者,谓之折中仓,有里、外河二名,又有茶库仓,或空则兼受船般斛斗。草场则汴河南北各三所,骐驎、左右天厩坊、天驷监各一所,以受京畿租赋及和市所入。诸州皆有正仓、草场,受租税、和籴、和市刍粟,并掾曹主之。其多积之处,亦别遣官专掌。凡漕运所会,则有转般仓。

太祖皇帝乾德二年,令诸州自今每岁受民租及管榷所获之课除支度给用外,凡缗帛之类,悉辇送京师,官乏车牛者,僦民车以给。

六年,令诸州辇送上供钱帛,悉官给车乘,当水运者,官为具舟,不得调发居民,以妨农作。

初,荆湖、江、浙、淮南诸州,择部民之高赀者部送上供物,民质不能检御舟人,舟人侵盗官物,民破产以偿,乃诏遣牙将部送,勿复扰民。

自江南平,岁漕米数百万给京师,太宗恐仓吏给受不平,遣皇城卒变服侦逻,廉得永丰仓持量者八辈受赍为奸,悉斩之,监仓免官治罪。

端拱元年,徐休复上言:“京师内外凡大小二十五仓,官吏四百二人,计每岁所给不下四百万石,望自今米、麦、菽各以一百万石为一界,每界命常参官、供奉官、殿直各一人,专知、副知各二人,凡七人共掌之。”诏可。

二年,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:“晁错云‘欲民务农,在于贵粟’,盖不可使至贱,亦不可使至贵。今王都万众所聚,导河渠,达淮海,贯江湖,岁运五百万斛,以资国费,此朝廷之盛,臣庶之福也。近来都下粟麦至贱,仓禀充牣,红腐相因,或以充赏给,斗直数十钱,此工贾之利而军农之不利也。夫军士妻子不过数口,而月给粮数斛,即其费有余矣。百万之众,所余既多,游手之民,资以给食,农夫之粟,何所求售?况粮之来也,至远至艰;官之给也,至轻至易。岁之丰俭,不可预期,倘不幸有水旱之虞,卒然有边境之急,何以救之?今运米一斛至京师,其费不啻三百钱,诸军傭人旧日给米二升,今若月赋钱三百,人必乐焉。是一斗为钱五十,计江淮运米工脚,亦不减此数。望明敕军中,各从其便,愿受钱者,若市价官米斗为钱二十,即增给十钱,裁足以当工脚之费,而官私获利,数月之内,米价必增,农民受赐矣。若米价腾踊,即官复给粮,军人傭其所余,亦获善价,此又戎士受赐矣。不十年,官有余粮,江外之运,亦渐可省。”上览奏嘉之。

天禧末,京城所积仓粟一千五百六十万余石,草一千七百万五千余围。

国初以来,四河所运粟未有定制。至太平兴国六年,汴河岁运江淮米三百万石,菽一百万石;黄河粟五十万石,菽三十万石;惠民河粟四十万石,菽二十万石;广济河粟十二万石;凡五百五十万石。非水旱大蠲民租,未尝不及其数。至道初,汴河运米至五百八十万石。自是,京城积粟盈溢。大中祥符初,至七百万石[凡漕运,大约其数,亦计临时移易焉]。凡水运自淮南、江南、荆湖南、北路所运粟,于扬、真、楚、泗州四处置仓以受其输,既而分调舟船溯流而入京师,置发运使领之。荆湖、江、淮、两浙以及岭表金银、香药、犀象、百货亦同之。惟岭表陆运至虔州而后水运[咸平五年七月,又命户部判官凌策,与江南转运同计度,省自京至广南香药驿递军士及使臣计六千一百余人]。陕西诸州菽粟,自黄河三门沿流由汴河而至,亦置发运使领之。陈、颍、许、蔡、光、寿等六州之粟帛,由石塘、惠民河而至。京东十七州之粟帛,由广济河而至,皆

有京朝官廷臣督之。凡三水皆通漕运,而岁计所赖者,惟汴流焉。河北卫州东北有御河达乾宁军,其运物亦有廷臣主之。川陕诸州金帛,自剑门列传置,分辇负担,以至租布、及官所市布,由水运送江陵。自江陵遣纲吏运送京师,咸平中,定岁运六十六万匹,分为十纲[旧常至数百万匹]。天禧末,水陆上供金帛、缗钱二十三万一千余贯、两、端、匹、珠宝、香药二十七万五千余斤。诸州岁造运船,至道末三千三百三十七艘,天禧末减四百二十一[虔州六百五,吉州五百二十五,明州一百七十七,婺州一百三,温州一百二十五,台州一百二十六,楚州八十七,潭州二百八十,鼎州二百四十一,凤翔斜谷六百,嘉州四十五]。

止斋陈氏曰:“本朝定都于汴,漕运之法分为四路。江南、淮南、浙东西、荆湖北六路之粟,自准入汴至京师;陕西之粟,自三门、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;陈、蔡之粟,自闵河、蔡河入汴至京师;京东之粟,自五丈河历曹、济及郛至京师,四河所运惟汴河最重。

景德中,漕东南粟岁不过四百五十万石,后增至六百万。天圣中,发运使请所部六路计民税一石,量余粟二斗五升,岁可更得二百万石给京师。仁宗曰:“常赋外增余,是重扰民。”不许。时江南谷贵民贫,尚书员外郎吴耀卿以为言,诏岁减五十万,后是三司奏,复增至六百万。然东南灾歉,辄减岁漕数,或百万或数十万。又转移以给他路者时有焉。

庆历中,诏减广济河岁漕一十万石。后黄河岁漕益减耗,才运菽三十万石,而岁创漕船,市材木,役牙钱,劳费甚广;嘉祐四年,诏罢所运菽,减漕船三百艘。自是岁漕三河而已。

江、湖上供米,旧转运使以本路纲输真、楚、泗州转般仓,载盐以归,舟还其郡,卒还其家。而汴舟诣转般仓漕米输京师,岁擢运者四。河冬涸,舟卒亦还营,至春复集,名曰放冻。卒得番休,逃亡者少;而汴船不涉江路,无风波沈溺之患。其后发运使权益重,六路上供米团纲发船,不复委本路,独发运使专其任。文移益并,事目繁夥,有不能检察,则吏胥可以用意于其间。操舟者赋诸吏,辄得诣富饶郡市贱贸贵,以趋京师。自是江、汴之舟,合杂混转无辨矣,挽舟卒有终身不还其家而老死河路者。籍多空名,漕事大敝。皇祐中,发运使许元奏:“近岁诸路因循,粮纲法坏,遂令汴纲至冬出江,为他路转漕,兵不得息。宜敕诸路增船载米,输转般仓充岁计如故事。”于是言利者多以元说为然,朝廷为诏如元奏。久之,而诸路纲不集。嘉祐三年,复下诏切责有司以格诏不行,及发运使不能总纲条,转运使不能斡岁入,预敕江、淮、两浙转运司,以期年功,各造船补卒,团本路纲,期自嘉祐五年汴纲不得复出江。至期,诸路船犹不足。汴纲既不得至江外,江外船亦不得至京师,失商贩之利;而汴纲工卒讫冬坐食,苦不足,皆盗毁船材,易钱以自给,船愈坏,漕岁额又愈不及。论者初欲漕卒得归息,而近岁汴纲多佣丁夫,每船卒不过一二人,至冬当留守船,实无得归息者。时元罢久矣。后至者数奏请出汴船,执政守前诏不许。御史亦以为言。治平三年,始诏出汴船七十纲,未几,皆出江复故。治平二年,漕粟至京师,汴河五百七十五万五千石,惠民河二十六万七千石,广济河七十四万石。又运金帛缗钱入左藏库、内藏库者,总其数一千一百七十三万,而诸路转移以相给者皆不与焉。由京西、陕西、河东运薪炭至者,薪以斤计为一千七百一十三万,炭以秤计为一百万。是岁,诸路创漕船二千五百四十艘。大约京师岁费粟四百余万石,刍四百余万围,粟则漕运之人及畿县岁赋、商人入中皆在焉,刍亦赋于畿县,或体量和市。既而罢商人入中粟,至景祐初议复之。论者或谓余京师,则谷价翔贵,命官度利害,后虽复之,然入中者无几。刍以体量和市者,遇岁俭则蠲之,前后不可胜数。至和中,一岁凡蠲二十五万。三司尝请以布偿刍直,登、莱端布为钱千三百六十,沂布千一百。仁宗以取直过厚,命差减其数云。

英宗治平四年,三司言:“京师粳米支五岁余,久且陈腐,请令发运司以上供谷五十万石糴谷贵处,市金帛储榷货务,以给三路军需。”从之。

发运司始于仁宗。时许元自判官为副使,创汴河一百纲,漕荆湖、江、淮、两浙六路八十四州米至真、扬、楚、泗转般仓而止,复从通、泰载盐为诸路漕司经费。发运司自以汴河纲运米入京师。

神宗熙宁七年,诏委官疏浚广济河,增置漕舟,依旧运京东米上供。

宣徽南院使张方平言:“国初,浚河渠三道以通漕运,立上供年额,汴河六百万石,广济河六十二万石,惠民河六十万石。广济河所运,止给太康、咸平、尉氏等县军粮而已,唯汴河运米麦,此乃太仓蓄积之实。

近罢广济河,而惠民河斛斗不入太仓,大众之命惟汴河是赖。议者不已,屡作改更,必致汴河日失其旧。愿留神虑。以固基本。”

京东察访邓润甫等言:“山东沿海州郡地广,丰岁则谷贱,可募人为海运。山东之粟可转之河朔,以助军食。”诏京东、河北路转运相度,讫无施行。

薛向为江淮发运使,先是,漕运吏卒上下共为侵盗贸易,甚则托风水沉没以灭迹。而官物陷折者,岁不减二十万斛。至向,始募客舟与官舟分运,以相检察,而旧弊悉去。

七年,提举汴河提岸司言:“京东地富,谷粟可以漕运,但以河水浅涩,不能通舟。近修京东河岸,开斗门通广济河,为利甚大。今请通津门里汴河岸,东城里三十步内,开河一道,及置斗门,上安水磨,下通广济河,应接行运。”从之。

八年,诏罢岁运粮百万石赴西京。先是,导洛入汴,运东南粟以实洛下,至是,户部奏罢之。

元祐七年,知扬州苏轼上言:“臣窃见嘉祐中,张方平论京师军储云:‘今之京师,古所谓陈留,四通八达之地,非如雍、洛有山河之险足恃也,特恃重兵以立国。兵恃食,食恃漕运,漕运一亏,朝廷无所措手足。’因画十四策。内一项云,粮纲到京,每岁少欠不下六七万石,皆以折会填偿,发运司不复抱认,非祖宗之旧也。臣以此知嘉祐前,岁运六百万石,而以欠折六七万石为多。访闻去岁止运四百五十余万石,而欠折之多,约至三十余万石,运法之坏,一至于此。臣到任以来,所断粮纲欠折等人不可胜数,衣粮罄于折会,船车尽于折卖,质妻鬻子,聚为乞丐,散为盗贼,窃计京师及缘河诸郡,例皆如此。盖祖宗以来,通许纲运,揽载物货,既免征税,而脚钱又轻,故物货流通,缘路虽失商税,而京师坐获富庶。自导洛司废,而淮南转运司阴收其利,数年以来,官用窘逼,转运司督迫诸处税务,日急一日。谨按一纲三十只船,而税务监官不过一员,未委如何随船点检得三十只船一时皆遍,而必勒留住岸一船点检即二十九只船,皆须住岸伺候。以淮南一路言之,真、扬、高邮、楚、泗、宿六州军所得粮纲税钱,不过万缗。而所在税务专栏,因金部转运司许令检点,缘此为奸,邀难乞取,十倍于官。遂致纲稍皆穷困骨立,亦无复富商大贾肯以物货委令搭载。以此专仰攘取官米,无有限量,折卖船板,动使净尽,事败入狱,以命偿官。显是金部与转运司违条刻剥,得粮纲税钱一万贯,而令朝廷失陷纲运米三十余万石,利害皎然。臣闻东南馈运,所系国计至大,故祖宗以来,特置发运司,专任其责,选用既重,威令自行。如昔时许元辈,皆能约束诸路,主张纲运,其监司州郡及诸场务,岂敢非理刻剥邀难?但发运使得人,稍假事权,申明元祐编敕,不得勒令住岸条贯,严赐约束行下,庶刻薄之吏不敢取小害大,东南大计,自然办集。”

徽宗大观三年,尚书省言:“六路上供斛斗已令直达,而奉行之吏因循,止将岁贡额斛于真、扬、楚、泗仓廩为卸纳折运之地。又以所管斛斗代诸路岁额不足之数,且欠发运司米一百二十余万斛不偿。乞将见在斛斗尽令般发赴朝廷。”从之。

转般之法,东南六路斛斗,自江、浙起纲至于淮甸,以及真、扬、楚、泗,为仓七以聚蓄军储。复自楚、泗置汴纲般运上京,以发运使董之。故常有六百万石以供京师,而诸仓常有数年之积。州郡告歉,则折纳上等价钱,谓之额斛。计本州岁额,以仓储代输京师,谓之代发。复于丰熟以中价收采。谷贱则官采,不至伤农,饥歉则纳钱,民以为便。本钱岁增,兵食有余。国家建都大梁,足食足兵之法,无以加于此矣。崇宁初,蔡京为相,始求羡财以供侈费,用所亲胡师文为发运使,以余本数百万缗充贡,人为户部侍郎。自是来者效尤,时有进献,而本钱竭矣。本钱既竭,不能增采,而储积空矣。储积既空,无可代发,而转般无用矣。乃用户部尚书曾孝广之说,立直达之法。时崇宁三年九月二十九日也。孝广之言曰:“往年南自真州江岸,北至楚州淮堤,以堰渚水,不通重船,般剥劳费。遂于堰傍置转般仓,受逐州所输,更用运河船载之入汴,以达京师。虽免推舟过堰之劳,然侵盗之弊由此而起。天圣中,发运使方仲荀奏请度真、楚州堰为水闸,自是东南金帛、茶布之类直至京师,惟六路上供斛斗犹循用转般法,吏卒糜费与在路折阅,动以万数。欲将六路上供斛斗,并依东南杂运直至京师或南京府界卸纳,庶免侵盗乞贷之弊。自是六路郡县各认岁额,虽湖南、北至远处所,亦直抵京师,丰不加采,歉不代发。方纲米之来也,立法峻甚,船有损坏,所至修整,不得逾时。州县欲其迹过,但令供状,以钱给之,以至沿流乡保悉致骚扰,公私横费,无有纪极。又盐法已坏,回舟无所

得,舟人逃散,船亦随坏,本法尽废,弊事百出,良可叹也。”

谭稹言:“伏读圣训,自转般之法废为直达,岁运仅足。自开岁纲运,不至两河,所余所般,数目不多,何以为策?令臣询访措置以闻。窃详祖宗建立真、楚、泗州转般仓之本意,可谓至密。一则以备中都缓急,二则以防漕渠阻节,三则纲般装发,资次运行,更无虚日。自其法废,河道日益浅涩,遂致中都粮储不继,仰烦圣训,丁宁训饬,谓淮南三转般仓,今日不可不复,置淮南路泗州,江南路真州,两浙路楚州。仍乞先自泗州为始,候一处了当,次及真、楚,既有余本,顺流而下,不甚劳费。乞赐施行,然后俟丰岁计置储蓄,取旨立法转般,以为永法。”诏:“稹所陈利害甚明,并可依奏。候睦贼平日,令发运司措置施行。”五年二月,新淮南路转运判官向子諲奏:“转般之法,寓平糴之意,江、湖有米,则可余于真;二浙有米,则可余于扬;宿、毫有米,则可余于泗。坐视六路之丰歉,间有不登之处,则以钱折斛,发运司得以斡运之,不独无岁额不足之忧,因以宽民力。万一运渠旱干,则近有汴口仓庾,今日所患者,向来余本岁五百万缗,支移殆尽,难以全仰朝廷。乞将经制司措置地契、卖糟、量添七色等钱,以桩充余本,假之数年,可以足用。”六月,诏特支降度牒一百万贯,香、盐钞一百万贯,付吕棕、卢知原均斛斗,专充应副转般。令尚书省措置取旨。

大观以后,或行转般,或行直达,诏令不一。

政和元年,张根为江西转运副使,岁漕米百二十万以给中都。江南州郡僻远,官吏艰于督趋,根常存三十万石于本司为转输之本,以宽诸郡,时甚称之。

高宗建炎初,诏诸路纲米以三分之一输行在所,余赴京师。二年八月,诏二广、湖南北、江东西路纲运赴江宁府,福建、两浙路赴平江府,京畿、淮南、京东西、河北、陕西路及川纲并赴行在。又诏二广、湖南北纲运如经由两浙,亦许赴平江府送纳;福建纲运经由江东、西,亦许赴江宁府送纳。三年闰八月,又诏诸路纲运除见钱并粮斛赴建康府户部送纳外,其金银绢帛并赴行在所。绍兴初,因地之宜,以两浙之粟专供行在,以江东之粟饷淮东,以江西之粟饷淮西,荆湖之粟饷岳、鄂、荆南。量所用之数,责漕臣将输,而归其余行在,钱帛亦然。惟水运有舟楫之劳,陆运有夫丁之扰,雇舟差夫,不胜其弊,民间有自毁其舟楫不愿藏舟,自废其田而不愿有田。王事鞅掌,人胥病之,于是申水脚糜费七分钱三分钱法,严卸纲无欠复拘留人船之戒,虑掳船之为民害也。既优价雇募客舟矣,又许将一分力胜搭带私物捐其税,及于两浙、江东西、四川泸叙嘉黔间自造官舟。又揆道里之远近,滩碛之险阻,置转般仓;修堰闸,开浚河道。以便漕运。

绍兴四年,川陕宣抚吴玠调两川夫运米十五万斛至利州,率四十余千致一斛,饥病相仍,道死者众。漕臣赵开听民以粟输内郡,募舟挽之,人以为便。然嘉陵江险,滩碛相望,夏苦涨流,冬阻浅涩,终岁之运,殆莫能给。玠再欲陆运,帅臣邵溥争之,且言:“宣司已取蜀民运脚钱百五十万,其忍复使之陆运乎!”乃卒行水运。总领所委官就余于沿流诸郡,复就兴、利、夔州置场,听客人中卖。又减成都水运对余米,免四川及京西路诸州租以宽之。

纲运之官,其责繁难,人以为惮。故自绍兴以来,优立赏格,其有少欠,许余填补足,其纲欠及一分,才送有司究弊。后来献说者止欲从窄减作五厘,且以百石论之,五厘止五斗耳,使之全无侵蠹,当风扬掷,亦不免五厘之少,则举无纳足之纲。于是户部言:“乞将少欠五厘以上,一分以下之人,立限二十日余填。”

孝宗淳熙元年,诏:“不以所欠多少,并与放除。其纲米赴仓卸纳,以陈易新,不得就舟支遣。其折帛钱纲在路违法借贷重其罚,或借贷官钱收买物货无偿,许估卖出豁其金银钱帛色额;低次亏损官钱者,行下元买纳场吏人名下追理,不得均摊民户。其有因纲运欠折追降官资者,如本非侵盗,且补纳已足,许保明叙复。”
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:“本朝东南岁漕米六百万石,而江西居三分之一,盖天下漕米多取于东南,而东南之米多取于江西也。”东莱吕氏曰:“古者,天子中千里而为都,公侯中百里而为都。天子之都,漕运东西南北,所贡入者,不过五百里;诸侯之都,漕运所贡入者,不过五十里。所以三代之前,漕运之法不备。虽如《禹贡》所载入于渭,乱于河之类,所载者不过是朝廷之路;所输者不过币帛九贡之法。所以三代之时,漕运之法,未甚讲论,正缘未是事大体重。到春秋之末,战国之初,诸侯交相侵伐,争事攻战,是时稍稍讲论漕运之法,然所论者尚只是行运之漕,至于国都之漕,亦未甚论。且如《管子》所论,粟行三百里,则无一年之

积粟;行四百里,则无二年之积粟;行五百里,则众有饥色;如孙武所谓千里馈粮,士有饥色,皆是出征转输,至其所以输国都不出五百里、五十里,国都所在各有分,故当时亦尚未讲论。惟是后来,秦并诸侯,罢五等,置郡,然后漕运之法,自此方详。秦运天下之粟,输之北河,是时,盖有三十钟致一石者。地里之远,运粟之多,故讲论之详,方自此始。后来历代最盛,无如汉、唐。在汉初,高后、文、景时,中都所用者省,岁计不过数十万石而足,是时,漕运之法亦未讲。到得武帝,官多徒役众,在关中之粟四百万犹不足给之,所以郑当时开漕渠、六辅渠之类,盖缘当时用粟之多,漕法不得不讲。然当汉之漕在武帝时,诸侯王尚未尽输天下之粟,至武、宣以后,诸侯王削弱,方尽输天下之粟,汉之东南漕运,至此始详。当高帝之初,天子之州郡与诸侯封疆相间杂,诸侯各据其利,粟不及于天子。是时,所谓淮南东道皆天子奉地,如贾生说是汉初如此。至汉武帝时,亦大概有名而无实,其发运粟入关,当时尚未论江淮。到得唐时,方论江淮,何故?汉会稽之地去中国封疆辽远,开垦者多,粟不入京师,以京师之粟尚不自全,何况诸侯自封殖?且如吴王濞作乱,枚乘之说,言京都之仓不如吴之富,以此知当时诸侯殖利自丰,不是运江淮之粟。到唐时,全倚办江淮之粟。唐太宗以前,府兵之制未坏,有征行,便出兵,其不征行,各自归散于田野,未尽仰给大农,所以唐高祖、太宗运粟于关中不过十万。后来,明皇府兵之法渐坏,兵渐多,所以漕粟自此多。且唐睿宗、明皇以后,府兵之法已坏,是故用粟乃多,向前府兵之法未坏,所用粟不多。唐漕运时,李杰、裴耀卿之徒未甚讲论,到二子讲论,自是府兵之法既坏,用粟既多,不得不讲论。且如汉漕系郑当时之议,却不曾见于高、惠、文、景之世。唐之李杰、裴耀卿之议,都不曾见于高祖、太宗之世,但只见于中、睿、明皇之时,正缘汉武官多役众。唐中、睿以后,府兵之法坏,聚兵既多,所以漕运不得不详。大抵这两事常相为消长,兵与漕运常相关。所谓宗庙、社谿之类,十分不费一分,所费广者,全在用兵,所谓漕运,全视兵多少。且唐肃宗、代宗之后,如河北诸镇,皆强租赋不领于度支。当时有如吐蕃、回纥为乱,所用犹多。振武、天德之间,岁遣两河诸镇,所以全倚办江淮之粟。议论漕运,其大略自江入淮,自淮入汴,自洛入河,自河入渭,各自征输,水次各自置仓。如集津仓、洛口仓、含嘉仓、河阴仓,渭桥转相般运,道途之远,此法遂坏。自当时刘晏再整顿漕运之法,江淮之道,各自置船,淮船不入汴,汴船不入河,河船不入渭,水之曲折,各自便习,其操舟者所以无倾覆之患,国计于是足。所以唐人议论之多,惟江淮为最急。德宗时,缘江淮米不至,六军之士脱巾呼于道,韩滉运米岁至,德宗、太子置酒相庆。可见唐人倚办于此,如此其急。唐时漕运,大率三节:江淮是一节,河南是一节,陕西到长安是一节。所以当时漕运之臣,所谓无如此。三节最重者京口。初,京口济江淮之粟所会于京口,京口是诸郡咽喉处。初时,润州、江淮之粟至于京口,到得中间,河南、陕西互相转输。然而三处惟是江淮最切,何故?皆自江淮发足,所以韩滉由漕运致位宰相,李锜因漕运飞扬跋扈,以至作乱。以此三节,惟是京口最重。所谓汉漕,一时所运,临时制宜,不足深论。到得宋朝定都于汴,是时,漕运之法分为四路:东南之粟自淮入汴至京师;若是陕西之粟,便自三门、白波转黄河入汴至京师;若是陈、蔡一路粟,自惠民河至京师。京东粟自广济河至京师。四方之粟有四路,四条河至京师。当时最重者惟是汴河最重,何故?河西之粟,江无阻,及入汴,大计皆在汴;其次北方之粟,自三门、白波入关,自河入汴入京师,虽惠民、广济来处不多,其势也轻。本朝置发漕两处,最重者是江淮至真州,陆路转输之劳;其次北之粟,底柱之门,舟楫之利。若其他置发运,如惠民河、广济河虽尝立官,然不如两处之重。此宋朝之大略如此。然而宋朝所谓岁漕六百万石,所专倚办江淮,其所谓三门、白波之类,非大农仰给之所,惟是江淮最重。在祖宗时,陆路之粟至真州入转般仓,自真方入船,即下贮发运司,入汴方至京师,诸州回船,却自真州请盐散于诸州,诸州虽有费,亦有盐以偿之,此是宋朝良法。凡以江淮往来,迟速必视风势。本朝发运使相风旗,有官专主管,相风旗合则无罪,如不合,便是奸弊。夫船之迟速,何故以风为旗?盖缘风动四方,万里只是一等,所以使得相风旗。真州便是唐时扬子江,后来本朝改号曰真州。运法未坏,诸州船只到真州请盐回,其次入汴、入京师。后来发运岁造船,谓之发运官船,与诸州载米发运,申明汴船不出江,诸州又自造船。虽有此约束,诸州船终不应付,因此漕法渐坏,惟发纲发运未罢。及蔡京为相,不学无术,不能明考祖宗立法深意,遂废改盐法,置直达江,无水处不如此。是时奸吏多,虽有运漕之官,不过催督起发,其官亦有名而无实。大抵用官船逐处漕运时,便都无奸计。若用直达江,经涉岁月长远,故得为奸,所费甚多,东南入京之粟亦少。故

太仓之粟少似东南蓄积,发运有名无实,此召乱之道也。本朝漕运之法坏自蔡京,东南发运本原大略如此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二十六·国用考四·赈恤

昭帝元凤三年,诏曰:“乃者民被水灾,颇匮于食,朕虚仓廩,使使者赈困乏,其止四年毋漕。三年以前所赈贷,非丞相、御史所请,边郡受牛者勿收责[武帝始开三边,徙民屯田,皆与犁、牛。后丞相、御史复间有所请。令敕自上所赐予勿收责,丞相所请乃令其顾税耳]。”

宣帝本始四年,诏曰:“今岁不登,已遣使者赈贷困乏,使农移就业。丞相以下至都官令丞上书入谷,输长安仓,助贷贫民,以车船载谷入关,得无用传[传,传符也。欲谷之多,故不问其出入]。”

仁宗、英宗一遇灾变,则避朝变服,损膳彻乐。恐惧修省,见于颜色,惻怛哀矜,形于诏令,其德厚矣。灾之所被,必发仓廩赈贷,或平价以粜;不足,则转漕他路粟以给;又不足,则诱富人入粟,秩以官爵。灾甚,则出内藏或奉宸库金帛,或鬻祠部度僧牒,东南则留发运司岁漕米,或数十万,或百万石济之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三十六·选举考九·举官

(大业三年)帝自江都幸涿郡,御龙舟渡河入永济渠,敕选部、门下、内史、御史四司于船前选补。受选者三千余人,徒步随船三千余里,不得处分,死者什一二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四十七·职官考一·官制总序

伏羲氏以龙纪,故为龙师名官[师,长也。龙纪其官长,故为龙师。春官为青龙,夏官为赤龙,秋官为白龙,冬官为黑龙,中官为黄龙。张晏曰:“庖牺氏将兴,神龙负图而至,因以名师与官也。”]共工氏以水纪,故为水师水名[共工氏,以诸侯霸有九州者。以受水瑞,故水名官]。

天子之六府,曰司土、司木、司水、司草、司器、司货,典司六职[府,主藏六物之税。此亦殷时制也。周制皆属司徒。司土,土均也;司木,山虞也;司水,川衡也;司草,稻人也;司器,角人也;司货,鬯人也。]。

(隋)大业三年,始行新令,有三台、五省、五监、十二卫、十六府[殿内、尚书、门下、内史、秘书,五省也。谒者、司隶、御史,三台也。少府、长秋、国子、将作、都水,五监也。左右翊、左右骁、左右武、左右屯、左右御、左右候、十二卫也。左右备身、左右监门等,凡十六府也。或是旧名,或是新置。诸省及左右卫、武侯、领军、监门府为内官,自余为外官]。

至开元二十五年,刊定职次,著为格令[此格皆武德、贞观之旧制,永徽初已详定之,至开元二十五年再删定焉。至二十八年,又省文武六品以下官三百余员及诸流外、番官等]。盖尚书省以统会众务,举持绳目。门下省以侍从献替,规驳非宜。中书省以献纳制册,敷扬宣劳。秘书省以监录图书。殿中省以供修膳服。内侍省以承旨奉引[尚书、门下、中书、秘书、殿中、内侍,凡六省]。御史台以肃清僚庶。九寺[太常、光禄、卫尉、宗正、太仆、大理、鸿胪、司农、太府,为九寺]、五监[少府、将作、国子、军器、都水为五监]以分理群司。

《文献通考》卷第五十二·职官考六·刑部尚书

魏青龙二年,置尚书都官郎,佐督军事。晋复以三公尚书掌刑狱。宋三公、比部皆主法制;又置都官尚书主军事、刑狱,领都官、水部、库部、功论四曹。